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看大学视界

## 定向生， 无力承受的断尾之痛

本报记者温才妃

新年伊始，某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王舟便许下了三个愿望——锻炼身体，和闺蜜旅行，取消定向，也就是违约。对于许下的第三个愿望，她的内心有过纠结，甚至一度颇为愧疚。

尤其是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9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确保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全部安排到中小学任教，并编入岗，严禁“有编不补”。

眼看毕业后有现成的“铁饭碗”，王舟的选择让亲戚、朋友难以理解。实际上，王舟只是诸多违约定向生的缩影，其背后经历的纠结、挣扎，也反映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定向生对职业选择的一种基本心态。

### 压在心口的“大石”

王舟刚入学的时候，公费师范生还被称为“免费师范生”。

去年8月，《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正式实施，“免费师范生”改为“公费师范生”。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把“免费”的提法改为“公费”，履约时间从10年缩短到6年。

即便是履约时间缩短至6年，对于打定主意违约的公费师范生而言，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很后悔当初自己的‘一念之贪’——考分不够高，只有读免费师范生，才能以相对低的分数进入这所大学，完全没有考虑职业的适合问题。”口才并不好、一上讲台就紧张的王舟，自言并不是当老师的料。这也是她决定违约的重要原因。

“退出”的程序尽管有些烦琐，但在一次性退还所享受的公费教育费用，缴纳违约金50%的违约金之后，王舟还是可以离开。

而对于北京某高校的重工业定向生张同而言，违约的紧张程度远胜于王舟。“我们的毕业证、学位证卡在用人单位手里，如果不履约，不仅要赔付培养费、违约金，而且5年内毕业证被扣，找工作、考研、申请国外大学都会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你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进入这所大学，但很快发现‘定向生’的身份意味着‘低人一头’。因为别人会不自觉地默认你是低分生，脑袋不如别人灵光。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的分数并不比统招招生低”。张同说。

未来的方向已经锁定，在某个偏远地区，甚至该企业可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名校人才。“不少已毕业的学长感叹，如果不是选择了定向生，他们会发展得更好。”张同补充道。

当然，定向生也可以考研，但是选择权依然被限定得很死。王舟告诉《中国科学报》，公费师范生虽允许攻读在职研究生，但只有这一个选择，其他均不允许报考。

学医的大学生往往被鼓励考研、考博，然而，定向生考研需要征得定向单位同意。针对乡村医生培养的定向医学生，往往遭遇这样的尴尬。“乡镇医院院长会告诉你，我们这儿不需要研究生，你还是直接来上班吧。于是，深造计划就泡汤了。否则，就会被视为违约。”西部某高校免费医学生陈燕无奈地说。

### 逐渐走向没落的制度

相对于自主招生、保送生、统招招生等耳熟能详的招生类别，定向生已经让人觉得遥远而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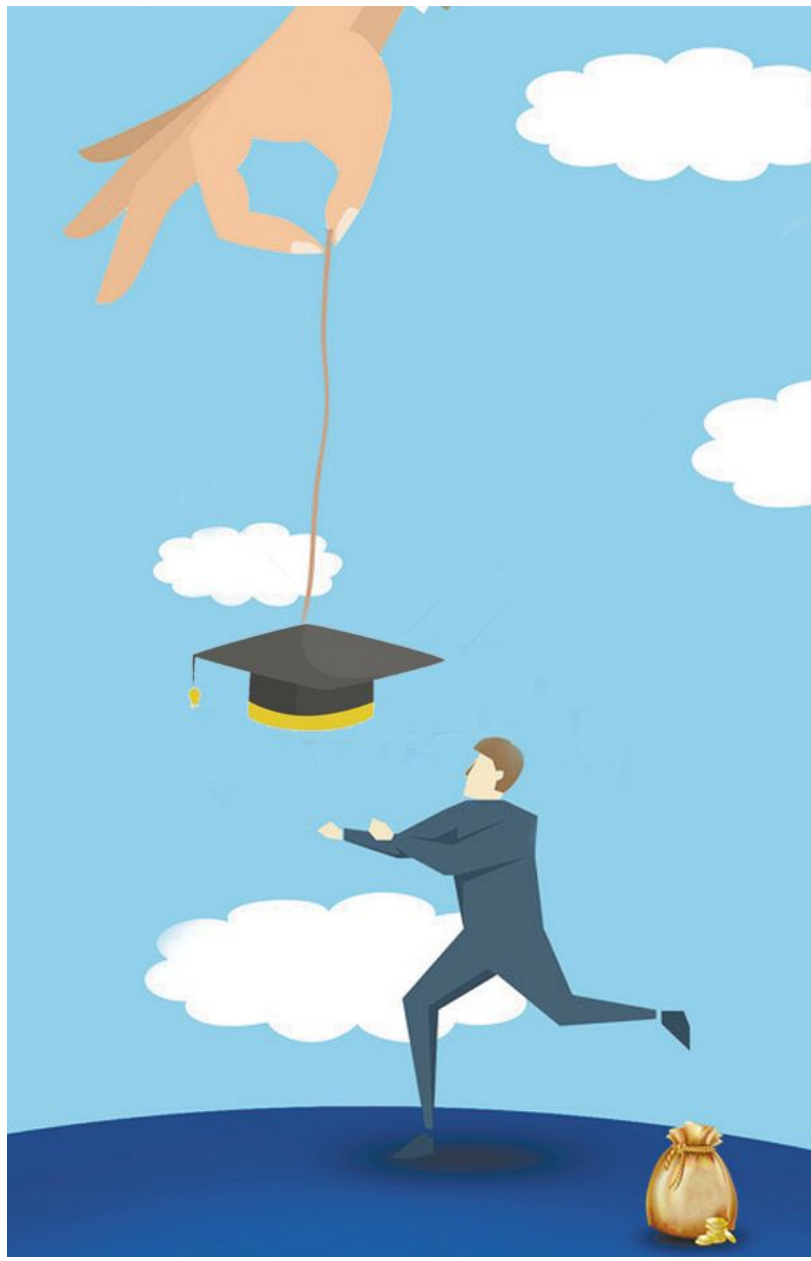
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定向招生制度，是国家为了解决艰苦地区、艰苦行业以及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人才“分不去、留不住”的困难，而专门制定的一项招生与就业相结合的特殊招生政策。

通俗地说，学生进入定向培养计划后，在校期间学费全免，而且毕业后分配。“铁饭碗”听起来很有诱惑力，但享受优惠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毕业后须去特定地区或行业工作6~10年。否则要偿还培养费以及违约金，甚至有的还会影响诚信记录。

定向生范围曾经涉及农业、林业、矿业、地质、煤炭、石油、水电、建材、气象、测绘等众多行业。但随着1993年我国推进市场化就业，采用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方式来实现就业后，定向生制度逐渐在走下坡路。

2017年，持续了近20年的国防生制度停止招生，这被业内视为定向生制度的重大转折。如今，在定向生方阵中，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公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生。

是否报考定向生在于个人选择，享



受了低分进入的权利，违约时自然要付出相应代价。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有些想当然。起码，中国的中生在填报志愿时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值得打问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今面向市场就业存在一个问题，一些学生在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的时候，只是想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进入大学后，他们易出现两种问题心态：一种是认为今后就业有保障，就不努力学习，这部分人并不鲜见，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另一种则是内心拒绝去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要么违约，要么勉强就业，但对职业的认同感不高，并不愿意继续留下来服务。

“卡1人，10人、100人也就不错了。如果出口定得过死，考生在起点上就会拒绝进入；如果出口有一定灵活性，起点还能招到高端生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就是定向生单列招生导致的低分录取现象。人口相对低端，进入教师岗位的多是低期望、低能力者，这部分人走上教师岗位，对长久的教育发展并不有利。

熊丙奇补充，随着教育部强调公费师范生落实任教，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其他真心愿意去当乡村教师的学生“进不来”，因为首先要保证公费师范生任教有编在岗。

### 计划思维能否被修正

定向生制度就像计划经济留下的一条尾巴，体现的是计划招生、计划培养、计划就业的思路，面临着与市场脱轨、设置与现实不吻合等问题。无力承受断尾之痛，教育部门仍不断通过政策加以修正，以期提高教育环节的吸引力，然而效果却差强人意。

在熊丙奇看来，理想的方式是所有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报考专业，在就业环节再作选择——是否加入乡村计划成为教师、医生，加入者享受学费代偿或就业优惠，学费由高校返还。如果不能做到完全按市场就业，则让学生入学后自由选择，愿意加入乡村计划成为教师、医生者，享受计划带来的优惠。

“招生环节上实行差异化，容易激发矛盾。”熊丙奇指出，曾有人提出，如今一些高校的公费师范生的招生分数也很高，为什么不能退出？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会认为高分公费师范生的退出是合理的，因为当初他们进入的是单列的招生计划。因此，录取之后作选择，既可以避免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录取的机会而作选择，又有助于想进入的学生加深对公费师范生的认识、了解。

如果该问题尚不能解决，起码“不要过分限定招生范围（目前公费师范生招生范围为部属师范院校和部分自愿

加入的地方师范院校），公费师范生的范围应扩大到更多地方师范院校，招真正的志愿者”。储朝晖建议，同时，入口要有明确的要求，规定低于某个分数线不能录取。在招生数量上也不要勉强，能招多少就招多少，不要人为定死。

此外，储朝晖认为，在制度的设计上，观念要有所更新。过去都是部门制定方案，而没有考虑多个主体的体验、感受，要有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包括有意愿加入定向的学生、家长、乡村学校或定向单位，共同商讨合理的方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向记者反映，由于生均经费与招生数量相挂钩，“一个快要关张的专业，突然与定向生项目挂钩，意味着‘起死回生’，所以有些高校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一些定向单位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后，可能不需要也留不住那么多高端人才，慢慢地，定向生就成为了高校愿意、企业、学生不乐意的‘鸡肋’项目”。

“如果人才需求量少，就没必要单列为定向项目。从高校角度而言，应该培养更专业、更高端的人才，学生在产业里是高端人才，自然有市场选择，并不一定要国家埋单。”储朝晖说，尤其是2005年国家取消地方院校定向招生，定向生原则上只对部属院校开放，而部属院校的招生、培养还存在不接地气等问题，这都会影响定向生培养质量。

### 密不可分的外界因素

除开教育本身的问题，定向生制度的未来还与社会环境、职业吸引力密不可分。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等师范学校兴起，中师设在县城，学生毕业后回乡就业，矛盾冲突并不明显。而如今师范大学多设在省会城市，再让学生回乡任教，比起当年从县城回乡，难度大了很多。

储朝晖指出，跳出乡村是不少农村学子的愿望，再让他们回到乡村，似乎并不太乐意。

而社会背景又加重了他们另一重担忧——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当前我国城乡差距在逐渐扩大，城市下农村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农村进城却是难上加难，一名乡村教师想要调回城里，要连续三五年打报告才能获批调动。“城乡之间自由调动尚且不易，更不用说从一开始就进入乡村。”储朝晖说。

在储朝晖看来，这些都是“根子”上的问题。“公费师范生制度相当于既是既定目标的垫脚石，尽管其存在还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仅靠这块垫脚石还够不着目标，只有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教师的待遇、地位大幅提高，城乡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发挥公费师范生制度应有的效力。”只考虑培养环节，是很难从根本问题上解决问题的。

他补充说，给回乡任教者更好的机会、更高的待遇，不一定只锁定在公费师范生群体，而是要针对整个乡村教师群体，否则就会出现同工不同酬、差异巨大的新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曾对此建议，《教师法》应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职称教育公务员的规定，规定要具体而非笼统。在国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身份是教育公务员，享有公务员相关待遇，这对我国基层师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1月7日，历时48小时的“教育设计48H晋级赛”，在学生与导师的倒数声中结束了创作环节。来自全国高校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影视传媒、数字媒体、艺术学、软件工程等专业的60位参赛选手，带着通宵达旦的疲惫与“急中生智”的兴奋，对接下的项目展示环节充满期待。

教授老年人知识的教学App、帮孩子树立安全意识的VR（虚拟现实），可以不断提出反向“脑洞大开”的儿童智能机器人……每一个创意背后都注入了学生对于社会与未来的理解。

此次比赛的导师、疯果创意设计研究院院长温泉看着台上侃侃而谈的学生，时不时用自拍杆拍短视频。他说：“与结果相比，这个过程带给学生的已经足够了。”

### 用陌生挑战未知

将时针拨回1月5日上午9点，这场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师大教育哲学和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承办的“智慧学习·设计教育学术周”系列活动之“教育设计48H晋级赛”在北京中关村互联网创新教育中

## 现场 一场48小时的创意战

本报记者袁一雪

心拉开帷幕。来自多所高校的学生自由组队，在48小时中通力合作，完成设计挑战，比拼创新才智。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助理年智英、北京理工大学产品设计系副主任马东明、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讲师王瀚森和温泉作为导师正式“上岗”。接下来，通过互选，60名学生组成11个队，开始接受赛事的严峻考验。

因为来自不同高校和专业，所以队伍大多为“混搭”。比如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产品设计系的王寅生是参加此次比赛为数不多的本科生之一。他在所组别的队长是北师大教育技术方向研究生柳昌灏，专业方向是VR和AR（增强现实）等教育技术。这让从未接触过虚拟现实技术的王寅生对这项技术有了新的了解。同样，比赛碰撞的火花也让柳昌灏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来自北师大的教育学专业的高博俊在组队时，遇到

了同是教育专业的杭州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队友。因为专业类似，所以他们只花了半天时间就确定了从儿童的好奇心入手，开发一款可以根据儿童问题不断提出反问、引导儿童深入思考的智能机器人。为了更好地明确产品定位，他们进行了小范围的市场调查，最终将目标人群设定为3~8岁的儿童。

“在比赛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我很高兴在这里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每个人的能力都很强。”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张红妍告诉《中国科学报》。

### 出乎意料的坚持

为了不让选手过于疲劳，导师们在策划时也绞尽脑汁，希望在不打扰选手思考的同时起到放松的作用。他们选择比赛场地时，充分考虑了周围的坏环境。“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旁边

有健身房和台球厅。”年智英说。第一天下午，他们向选手们开放了这两个房间。“但是我发现根本没有人去，他们全部集中精神在讨论和做项目。”年智英说。而这种每个人都全力以赴的态度在平时集训分组时并不常见。

此外，导师们将比赛划分为几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的间隙选出“牛队”和“熊队”。“我们的选择标准不定，但被选出的‘熊队’会有个surprise time，让他们抽奖。”年智英说。抽到的可能是奖励，也可能是惩罚。很快，年智英就发现，学生们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抽奖了。

虽然压力大，但不论面对怎样的困难，熬夜到多晚，选手们都面带微笑。“参赛的同学都超乎想象地坚持着，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年智英说。

### 设计教育需要多领域融合

在最终的点评阶段，评委们并没有

因为这是一场只有48小时的赛事而放松对项目的要求，从创意本身到目标人群，再到其他竞赛作品，甚至是否能够形成良性的市场闭环，都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尽管在点评时表扬少、建议多，但是作为评委之一的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任宋慰祖在评审工作结束后，却对参赛选手设计的项目赞赏有加：“48小时并不宽裕，又赶上期末，学生关注到社会的痛点、热点，比如青少年性教育、安全教育、老年人教育和亲子教育等，提出很好的想法，给出了解决方法，并有了一定的设计基础，已经很不错了。”

宋慰祖希望这项比赛未来可以常态化，这样参赛者就会有更长时间作准备。“现代学科发展让学科之间成了平行线，却很少有学科交叉。但是设计产品的时候，却集合了科学、技术、艺术等多学科，才能创造出满足使用者需求的产品。”

在闭幕式上，北京设计学会监事长、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也表示，学术周符合跨界融合的理念，“关注创新设计，关注设计教育，就是关注国家未来希望所在”。

### 中国大学评论

上周，笔者所在的学院进行了一次学术盘点，很多教师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与学生在台下展开互动。上台展示的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国际学者；台下参与讨论的既有中国师生，也有外国师生。笔者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台上用中文展示，那么台下参与讨论的也一般用中文；如果台上用英文展示，那么台下参与讨论的也一般用英文。所以既有外国人说中文，也有中国人说英文，整个现场的语言转换显得非常自然。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近年来，国内高校界经常讨论的是用英文授课还是中文授课、英文发表还是中文发表的问题。其实，关于语言使用的讨论不仅仅在我国的高校界存在，很多英语非母语的国家的大学也都有过类似的讨论，甚至还促使了相关立法的出台。

近年来，荷兰就围绕大学教学到底是要用荷兰语，还是用英语进行，展开了大辩论。早在1991年，荷兰就通过《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对荷兰大学的语言使用进行了限定。荷兰《高等教育法》第7.2项条款要求除部分特殊情况外，荷兰大学的教学和考试必须以荷兰语进行。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或者说教育英语化的发展，荷兰的高校广泛开展了全英文教学，甚至有的大学所有的硕士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以此广泛吸引国际学生。

尽管大部分荷兰人能够使用英语，但是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英语化）还是让荷兰各界觉得难以接受。因此，近年来，关于荷兰语和英语的使用引起了高校的激烈讨论，继而引发了诉讼，即高等教育国际化（英语化）是否违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第7.2项条款。甚至荷兰议会于2015年发表宣言，呼吁荷兰高校遵守《高等教育法》第7.2项条款，保护荷兰语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领域的作用。2018年5月，荷兰大学协会发布联合文件同意对英语授课课程设限，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在该文件的基础上致函众议院，呼吁大学承担起平衡荷兰语与英语课程的责任。

虽然在荷兰存在着较大的讨论与争议，但笔者并不担心英语在我国高校的使用会冲击中文的使用，更不要说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了。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场景，中外师生轮流使用中文和英语，没有太多的違和感。

起码在现阶段，我国高校还是要加强英语的普及，包括英语课程、英语教材、英语展示、英语写作。这种举措倒不是像荷兰那样为了吸引国际学生，而是希望加强我国高等教育中，师生的国际学术交流，提高跟踪、学习与研究国际前沿知识的能力与机会。这是因为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是处于学习与跟随的阶段，离世界领先水平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要通过国际化的交流来缩短与世界领先水平之间的差距。

殷鉴不远。根据一些科技史的研究，在明朝初期，我国科技在很多领域尚属世界领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短短几十年间就开始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也就是说，在明朝中期，我国很多科技不再是世界领先，只不过和世界领先的距离不大。然而，由于持续不重视对外交流与学习，到了明朝末期，我国科技已全面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及至清朝闭关锁国，我国和世界顶尖水平的距离就变成了代差，并很快地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由于加大对外交流，在科技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而且，大量实证文章也证明了对外交流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应坚定不移地扩大国际交流，而要扩大国际交流就要提升国际交流能力，使用外语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尽管国内外关于外语与母语使用的讨论此起彼伏，但在我国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我国处于最低谷的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虽然有一系列中文拉丁化的运动，但是中文的方块汉字依然深入人心。在当前我国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我们更要有文化自信与语言自信，不要担心用英文学习、发表论文等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中国文化自信的丢失。相反，只有在交流中不断进步与强大，我国文化、语言才能更加自信。

所以，英语还是中文？这在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 使用非母语，不该是一个问题

李锋亮